

# 修辞构式的增殖效应及相关问题\*

## ——以变零构式为例

施春宏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北京 100083)

**提 要** 基于构式研究范式的基本观念,文章首先系统考察了变零构式(包括增零构式和减零构式)的生成机制及其语义增殖现象,并刻画了变零构式及其子构式的层级关系。接着以此为例外来讨论修辞构式的增殖效应及与此相关的若干问题。增殖效应的基本内涵及其产生基础,增殖效应对构式生成机制的路径依赖,修辞构式的网络系统和创新层级,修辞构式增殖效应分析的方法论原则,以及从构式的增值效应角度重新审视修辞效果的构式属性。文章还论及了修辞构式的语言共性问题。

**关键词** 修辞构式 变零(增零和减零) 增殖效应 网络层级 修辞效果 修辞类型学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17.03.004

### 一、引 言

刘大为(2010)从构式义的不可推导性及构式的语法化阶段出发将构式(construction)系统区分为语法构式和修辞构式:“语法构式指的是任何一种可从构成成分推导其构式义的构式,以及虽有不可推导的构式义,但已经完全语法化了的构式。”“修辞构式指的则是所有带有不可推导性的构式,只要这种不可推导性还没有完全在构式中语法化。”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统。这种区分对理解修辞问题具有鲜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目前学界关于构式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语法构式的形式和意义及其关系所做的探讨,而对修辞构式的分析则不多见,尤其是关于修辞构式所具有的不可推导性特征(大体包括在本文所论的增殖效应中,对此下文将重点阐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浮现的,这种特征跟修辞构式的形式和意义存在着怎样的关系,鲜有论述。另外,作为构式,有的修辞构式其形式依托于语法构式,如基于

---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YY001)和北京语言大学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 项目编号:16YJ050006)的支持。本文初稿曾在“纪念‘大众语’讨论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望道修辞学论坛”(复旦大学 2014 年 9 月 27-28 日)上宣读,与会期间得到陈光磊、胡范铸、祝克懿、吴春相等先生的指正,本文数易其稿,我的不同阶段在读硕博研究生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谨此一并致谢。特别感谢刘大为老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的悉心指导,使笔者得以认清很多问题,同时也深化了笔者进行修辞研究的目标。错谬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各种特殊搭配而形成的修辞构式,来源于对既有语言线性序列和结构关系的调变;有的并不必然依托于语法构式,如谐音、顶真等。显然,不依托于特定语法构式的修辞构式,其发展路向并不能实现构式的语法化。因此,这类修辞构式增殖效应产生的认知基础和生成机制显然有其特殊之处。基于此,本文以一种学界尚未深入阐发的、没有语法构式依托的修辞方式(即“变零”)及其所生成的修辞构式(即“变零构式”)为例,来探讨修辞构式的增殖效应及相关问题。

所谓变零,指下面这样的语言现象:

(1)这是一万零一年的一个石斧,价值二十万国魂。这是一万零二年的一套石碗,价值一百五十万。这是……三十万。这是……四十万。(老舍《猫城记》)

(2)中国人办事讲究的是完美周到,九十九拜都拜了不能闪下这一哆嗦。于是这两边山墙上也作出学问来。(邓友梅《四合院“入门儿”》)

这两例中画线的数字都是以交际系统中某些特定整位数(如“一万、一百”)为基数进行数学运算的结果。例(1)是在“一万”的基础上增加“一”或“二”,形成“一万零一”和“一万零二”;例(2)是在“一百”的基础上减去“一”,形成“九十九”。显然,这里的基数在语言使用者心理词库中,指某种事物或现象趋近极量或是带有夸张意味的最大值,而零数则是通过对这种“极量”或“最大值”的调整以表达特殊的语用效果。类似例(1)中这样的修辞手段,施春宏(2000)《增零》一文称之为“增零”,但该文对例(2)中这样的修辞手段尚未说明。实际上,两者在生成策略上具有一定的对称性,相对于“增零”,例(2)可以看作采取了“减零”的手段。因此可以将它们放到一个系统中来考察,从而探讨更高层面的生成机制、语义理解及其修辞效应。另外,施春宏(2000)对增零的分析尚有粗疏之处,尤其是尚未阐发增零手法及语用特征的生成机制。

本文便是基于类似上面两例这样的语言现象所做的考察,并进一步将两者整合成一个更高层面的修辞方式(即“变零”),同时基于构式语法的研究理念做出理论上的思考。基于刘大为(2010)对语法构式和修辞构式的区分,增零和减零自然属于修辞构式,不妨分别称作增零构式和减零构式(合为“变零构式”)。本文在刻画变零(包括增零和减零)作为构式的生成过程和语义层级系统的基础上,从构式创新的角度来审视修辞构式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网络系统,同时对传统修辞学关于修辞效果的理解提出新的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变零”中的“零”指零数,而非阿拉伯数字“0”。为了说明方便,本文将十(10)、一百(100)、一千(1000)、百分之百(100%)这样整十整百……整亿以及整百分数整千分数整万分数之类的“整”数称作“整位数”,将变零操作中对整位数进行调变的数量较小的数称作“零数”。有时,用于调变的零数并不是很小(如“包你一百二十分满意”和“说过一百八十遍”中添加于“一百”之上的“二十”和“八十”),只是相对于参与变零操作的整位数而言,它们都是附于其上的“零数”。

## 二、变零构式的生成过程、语义内容及其层级系统

### 1. 增零构式的生成过程和语义内容

从修辞方式和修辞效果的角度认识“增零”,其基本内容已见于施春宏(2000),此不赘述。但该文较多地受到传统辞格认识的限制,将基于同一形式的特殊表达方式都归入同一辞格并重在归纳其特殊的修辞效果,而未将辞格作为一种构式来认识这种构式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探讨其生成机制及增殖效应。这里则根据新的认识对增零手法做出新的分析。如:

(3)只骂奸商,不骂贪官,奸商是不会害怕的。怕触动官本位,腐败就有恃无恐。腐败的原因很多,一些反腐败的文章没有一针见血是第101条理由。打过静脉针的人都知道十针不见血不仅比不上一针见血,而且给病人增加了痛苦。(邓伟志《秀才加将才》,《文汇报》1998年11月25日)

(4)千万别做经理人的摇钱树!他们的一千零一个劝你出台的理由,无非是趁艺术家走红的时期多赚几文,哪里是为真正的艺术着想!(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170页,三联书店,1995年)

这两例中的“(第)101、一千零一”是在整位数“(第)100、一千”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零数“1”。通过在整位数上增加零数,呈现出数量更多、程度更深的意味,这是单纯的数字及其计算所不能包含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增零”。这些变化都通过数目字的调整而体现了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呈现出认知加工的某种倾向性,主要是通过增量而作势,进而浮现出新的语义内容和语用色彩。就此而言,将“增零”这种既有具体的表达形式(依存于数目词及其运算过程)又有特殊浮现意义的修辞方式称为修辞构式,是合理的。

显然,增零构式的生成基础是存在一个数目词语,并且这个词语在实际交际中又含有特殊的、规约化的语用意义和文化意义,或者在语境中被赋予特定的含义,而不只是简单的与客观数目相关的“叙实”表达。我们不妨称这种具有特殊内涵的数目词语为“定量语”,其所定之量,一是确定变零运算的基点数量(参照量),二是作为变零构式使用背景的心理“全量”。基于此,我们对“增零”做出新的理解:所谓增零,即以具有特殊内涵的定量语为基础,通过增加一个零数而构造出一个新的增量语以实现交际增殖效应的表达方式。上面两例都是在表示大量、极量的整位数的基础上的增零,如例(3)中“第101”所蕴涵的“第100”、例(4)中“一千零一”所蕴涵的“一千”,都已经固化或在具体交际中被赋予“量多”、“极多”的含义。如在“你说一千条理由也没有用”中,“一千”已经因具体语境而赋予其“多的极限”的语用义,而“一千零一”超越了该极限,表示更大的量。下例的生成路径正是依赖于“10”的固化语义:

(5)还有用数字表示特定意义的。美国的青少年发明了用(数字)呼机液晶屏幕上用数字互相联络、传情达意的传呼机的代码语言,被称为“新莫尔斯码”。例如:10:你十分完美。11:你比完美还完美。(引自刘海燕2002:106)

从“10”(十分)到“11”(意即十一分),产生了特殊的语用涵义。在大量、极量基础上再添零数,因此使“全部、很多”之类的程度更深。语用涵义通过在线交际时的语用推理浮现。

由此可见,当语言表达中的数字不表达叙实客观量、目的不在于数学计算本身时,数目字由“叙实”到“传意/传情”,凸显的是调变之外的意味。非常手段自有非常效应(特殊的意义和功能)。增零表达之所以能够实现,正是因为人们的认知经验中,特定的数目在整个数字系统和文化系统中具有相对凸显的地位,从而使其具有一定的语用义、文化义而凝固固化到语言交际系统中或在特定交际中可以被赋予特殊的内涵。增零构式的基本生成路径是:

第一步:存在一个具有或可以在线赋予特殊语义、语用内涵的定量语(设为X)→

第二步:在线提取数字X,将其作为数量调变的背景→

第三步:引入相对于X的零数 $n(n < X)$ ,并将其凸显为数量调变的前景→

第四步:在线运算 $X + n = Xn$ (+表运算方式,Xn表运算结果的增量语)→

第五步:将Xn运用到在线交际过程中,以产生增量的预期效果。

其中,第一步是作为言外的背景而存在于交际系统的构式库(constructicon,包含词库)中;

第二步和第三步是根据交际者的主观意图来安排信息,以作为增零操作的信息结构基础;第四步则是增零的显性过程,在作为背景的定量语语义特征的基础上,与所增之零的信息结合,通过在线运算得到含有新的语用信息的增量语;第五步将负载新语用信息的增量语用于具体交际场景中,实现“比X还多n”这样的语用增量。就此而言,增零的基本构式义可以大体概括为:“本已全量,却仍加增,调增零数,以示加量。”整个过程由此而浮现出所“增”之意。这种程序算法似的数学运算,使特定数字在虚实结合和转化过程中获得了特殊的语用增殖意义,实现了增量作势的修辞效果。

由于作为增零基础的原有数字和零数都有很多可能性,因此两者的整合使增零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只要语境合适,就可现实化。这种充分可能性和有效现实性在固定语的调变使用中体现得至为鲜明和充分。熟语、专名中使用增零的情况相当常见(有时作为增零基础的全量并非整位数),如“百分之一百零一(←百分之百)、十二分(←十分)、第361行(←第360行)、二百五十一(←二百五)”以及“37计(←36计)、十九般武艺(←十八般武艺)、十三点(←十二点)”等。像“《一千零一夜》(阿拉伯民间故事集)、章光101(毛发再生精)”等命名方式,都利用了增零的修辞手段。美国迪士尼经典动画片《101忠狗》(One Hundred and One Dalmatians)、日本电视剧和中国同名电影《101次求婚》、对外汉语教材《汉语会话301句》(康玉华、来思平编著)、台湾第一高楼“台北101购物中心”(地上101层),其数字虽有实际所指,但在命名之初,也是基于增零的生成机制。这些专名凸显的都是零数增加后的新奇的语用效果。

就笔者目前所见的用例来看,所增的零数大多是“1”。这是最为常见的情况,但并非必然如此。我们在网络上检索到这样的例子:

(6)没有不下台的演员,也没有不散场的观众。鼓掌一百零一次,也还有一百零二次的落幕。走吧,雨点在无声的飘落,泥土并不是它的墓园,只有长长的路是真实的,快乐地,热情地,认真的走吧。

(7)世界上有一万零一种死法,就有一万零二种死不了的原因。

(8)说过一万遍的话,别再让我说第一万零二遍。

其中零数非“1”的情况,常常是在零数为“1”的情况下逐步递增而来的。如例(6)和(7)中,在已增零的“一百零一、一万零一”的基础上再增零一次,形成“一百零二、一万零二”。我们可以将这种逐步增零的方式称作递增式增零。但也并非必然如此,如例(8)从“一万”直接跳到“一万零二”。如果说例(8)还可以看作蕴含“一万零一”这个过渡式增零表达的话,有时并不需此过渡而直接增加其他零数,如:“我何止是说过一百遍,说了一百八十遍也没有用!”

实际上,零数n是相当受限的,如果增量语是逐步递增而来,那么n一般为1或2,偶或为3,超过3就很难见到了,可接受度很低。如例(8)如果将“一万零二”改成“一万零九”则可接受度大受影响。就我们所搜检的真实语料而言,正是如此。如果Xn是类似“一百二十、一百八十”之类的增量语,那么其所增的n常见者也只有“二十、五十、八十”几个。千位数、万位数的增零也大体照此类推。由此可见,增零构式是一个原型构式,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这便是构式的部分能产性问题;下面的减零构式也是如此。

## 2. 减零构式的生成过程和语义内容

从生成机制的对称性角度来看,有增零就应该有减零,即出现“X - n = nX”(这里用nX表减零运算的结果,称作减量语)的运算及其表达方式。现实情况也确实如此。例如:



(9)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任弼时语,转录自冯国权、任立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员干部必须真抓实干》,东方出版社,2013)

(10)纵使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时代的误会,不还有百分之零点一是自己需要坦承的嘛!(冯景元《漫话华君武》)

例(9)中的“九十九”是基于整位数“一百”减去“一”;例(10)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基于整位数“百分之百”减去“百分之零点一”。“九数”(这里指末尾含有“9”的数,如“9、99、999、99%、99.9%”之类)或少于但接近“九数”的数,其所蕴含的量已经很大,但距整位数毕竟还差一点儿,因此可以用来指虽然已经趋于“全量”但尚不到位、有欠缺或略有欠缺。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构式的角度根据增零来理解减零。所谓减零,即以具有特殊内涵的定量语为基础,通过减去一个零数而构造出一个新的减量语,从而实现交际的增殖效应。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上述诸例所示,增零是强调超量,减零是凸出不及。就此而言,减零和增零处于一种对称的状态:两者以定量为中轴线,左为减量,右为增量。若是说增零的构式义是“本已全量,却仍加增,调增零数,以示加量”,那么减零的构式义则可以大体概括为:“本应全量,却见差数,调减零数,以示差量。”对增零而言,本已很多,仍然增数,自然就数量更多、程度更深了;对减零而言,几近全量,实际不足,可见存在差距。

然而,从生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来看,减零和增零却不完全对称。就识解而言,增零的语义方向从逻辑上只有一种可能,即:在本已很多的基础上,继续加增,以实现“好上加好”或“差之更差”的量度、程度递增。然而,减零的语义方向从逻辑上看,却大致可呈现出双向的读解:就定数而言,或者侧重于看到差距,或者侧重于看到接近(例子见下)。这样一来,增零和减零的语义结构自然就出现了不对称的一面。就此而言,减零构式就可以分化为两个子构式(sub-construction) 差量减零构式和近量减零构式。下面分别说明。

就差量减零构式(侧重于看到差距)而言,减零的语义内容又有两种可能,即这个子构式还可进一步分化出更具体的下位构式。一是“虽近全量,但仍欠足”,这是从凸显的零数来看定数,可称作“差量欠足减零构式”,上面例(9)(10)减零表达的基本构式义都是这一类。一是“本可全量,却呈未及”,这是从定数来看凸显的零数,可称作“差量未及减零构式”,其表达方式在生活场景中经常见到。如商家在给货品标价时,喜欢标上“99.9元、19.9元、9.9元”之类,就是利用顾客的交际心理:整十整百整千之类的数字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价格层次,而“99.9元、19.9元、9.9元”之类的“缩水”价格则似乎凸显了商家货品的让利行为。虽然在计算数字时多了一些不便,但心理上的满足则是可以期待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商家在玩数字游戏的意味。但这种玩法也是基于减零的策略。显然,这种表达体现了较多的交互主观性。将这两种情况的构式义做出进一步概括,差量减零大体可指“几近全量,但有距离”。

近量减零构式(侧重于看到接近)的语义内容是:“虽非全量,但已相近”,可见其大。如:

(11)她对这个和尚好像很熟悉,而且居然还用一种很亲热的态度对他说:“和尚,别人都说你老实,世上如果只有十万个人,最少有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都说你老实。”(古龙《陆小凤传奇》,珠海出版社,2009)

(12)她们毕竟是世俗之人,话题很快转到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们的中心要旨——孩子和丈夫上来。(胡辛《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13)别说我没听说过这种肯定曹操的话,我坚信那时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

也未曾听说过,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闻所未闻啊!(权延赤《红墙内外》,昆仑出版社,1989)

(14)有一姑娘号召:1.70米以下的男人均为“残废”。于是全国未婚妇女青年纷纷揭竿而起。我细细量过九十九次自己标高,实属“终生残废”系列。(木木《终生遗憾》,转自《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

这些例子中的“九数”都是表示量多、量大至极,并非不足。实际的意味就是绝大部分,甚至无数。<sup>⑩</sup>下例稍有特殊:

(15)“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地笑。(鲁迅《阿Q正传》)

句中的“九分”虽未达到“十分”,却已然很多,接近极量。因此也是近量减零构式形式。

由此可见,例(11)-(14)并不能看作类同于例(9)(10)的减零。下面例子中的对比使用更可见出两者之间的差异:

(16)我们掏了人家九毛九,让人掏走我们九十九、九百九,甚至九千九!(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中心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

其中的“九毛九”的生成背景是数量很少的“一块钱”,少之又少,因此所获似乎微不足道;但“九十九、九百九、九千九”则强调量大而极,因此所失去的也就非常大。

由此可见,差量减零是在定量语的基础上将定数减去零数,意指数量不足,这种情况跟增零相对应;而近量减零是从小的数字逐步递增至极大,但也以整位数为背景<sup>⑪</sup>,它跟增零不存在对应关系。就此而言,近量减零似乎是一种假性减零。

近量减零和差量减零,同样的形式,不同的内涵,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源自不同的生成路径,只不过形式上殊途同归了。因此,要正确理解它们的语义所指,需要从源头上做文章。

### 3.变零构式的层级系统

如果将增零构式和减零构式合起来看,则都可看成“变零构式”的子构式,即“ $X \pm n = Xn / nX$ ”。变零构式的基本构式义可以大体概括为“调变全量,凸显零数”,由于凸显的方式不同,结果是或加增(增零),或显差(减零)。基于上文描写,可以将变零构式系统的层级关系图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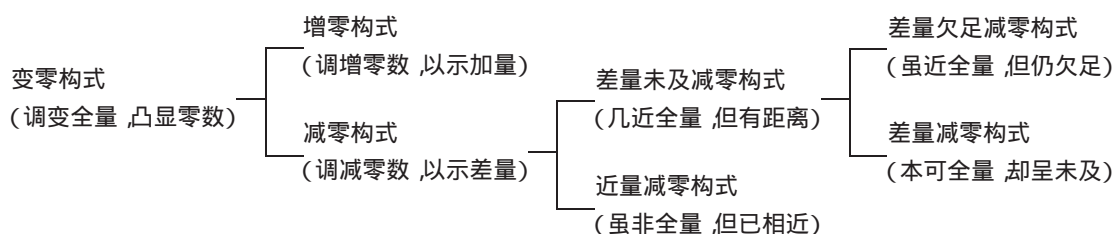


图1:变零构式系统的层级关系

当然,这样概括出来的构式义未必完全贴切(由此笔者深切地感受到日常语言表达在有的地方难以到位),尤其是越往上抽象,越难以呈现出己有他无的特征,抽象出来的语义内容因考虑到覆盖面而个性减弱<sup>⑫</sup>。

需要指出的是,前面所引诸例都是比较常规的变零方式。语言的创造性往往来自对常规的、典型现象的拓展,此时就更能见出修辞构式的特异性。这里再来看一下鲁迅杂文集《热风》

中的两例特殊的变零方式：

(17)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三》)

(18)画《泼克》的美术家说他们盲目盲心,所研究的只是十九世纪的美术,不晓得有<sup>1</sup>新艺术真艺术。我看这些美术家的作品,不是剥制的鹿,便是畸形的美人,的确不甚高明,恐怕连十“八”世纪,也未必有这类绘画,说到底,只好算是中国的所谓美术罢了。(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前一例是增零,后一例是减零,但在使用策略上均有特殊之处。由“六百零六”到“七百零七”,不是在六百零六的基础上加一百零一,而是将两个“六”分别加上“一”,得到七百零七。这种在递进式比较中推演出论点的做法,很有说服力。由“十九世纪”到“十八世纪”,不是将“十九”减“一”,而是将“九”减“一”得“八”,故作者在“八”上加了引号,以免人们将“十八”作实指性理解了。零数或增或减,幽默、讽刺的效果无以复加。这种变零的方式与鲁迅杂文的整体风格极其切合。这种局部分解式变零是对数字调变艺术可能性的充分展示,进一步挖掘了数字表达中蕴涵的魅力。

### 三、修辞构式的增殖效应

上面对变零构式层级系统的形式(此指生成的方式,不同于依托语法构式的形式)和语义内容做了较为具体的系统描述,下面基于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来探讨修辞构式的增殖效应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构式创新和修辞效果等。这一节首先从变零构式的特征浮现的路径看修辞构式的增殖效应(multiplication effect)。

所谓构式生成的“增殖效应”,指的是新生成的结构体在整合过程中浮现出了其组构成分所未包含或没有显现、不够凸显的语义内容。就变零构式而言,表达式“ $X \pm n = X_n / nX$ ”的整体特征并不能从“ $X, n$ ”和运算过程预测出来,也不能从其他修辞构式中推导出来,它在数字调变过程中增加或曰浮现了原有数字以及运算中所没有的语义和语用内容。也就是说,这些构式及子构式浮现出了某种特异性(idiosyncrasy),或者称其为浮现性特征(emergent feature),即产生了增殖效应。

构式增值效应是构式语法区别于非“构式”的语法理论的重要特征,对构式增殖现象的重视,正是构式语法考察语言现象的一个重要窗口。修辞研究,一直将这种“无中生有”“有中增多”的现象作为关注的重点,因此我们在刻画修辞现象的认知基础、生成机制时,应特别重视修辞构式增殖效应的浮现机制和具体表现。然而,对增殖现象或显或隐地关注,并不意味着就具有构式研究意识,其实,传统修辞研究很多时候只是将这种增殖现象视为特定的修辞效果来说明(参见下文第四节)。下面我们先讨论修辞构式增殖效应的认知基础和生成路径。

#### 1. 修辞构式增殖效应的认知基础和路径依赖

变零构式的增殖效应如何产生?每个构式都是一个格式塔(Gestalt,即完形,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体,具有不同于部分分离特性的浮现性特征。然而,这样说并不

意味着构式的浮现性特征不依赖其组构成分及组构过程、整合关系。修辞构式增殖效应的产生也依赖于各组构成分的意义及其本身在词库中所蕴涵的百科知识,也依赖于各成分之间的组配关系以及各组配成分之间的整合路径,也就是说修辞构式的增殖效应对构式的生成过程和机制具有一定的心理认知基础和显著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

修辞构式的产生(第一次产生特殊的增殖效应)始于一次性的、偶然的、个人的使用事件(use event)。若干次具有相同结构关系的使用事件的聚合,便形成了具有相对概括性的用法事件(usage event)<sup>⑭</sup>,其结构化方式和特征便随着具体表达式的多次强化而进入到心理构式库中。显然,这种基于使用事件、用法事件的构式形义关系结构化过程正是构式增殖的认知基础。例如增零构式“本已全量,却仍加增”的特征是由作为增零基础的定量语和零数通过具体运算整合、语用推理而来。新构式的语义特征对组构成分的语义特征有承继,也有发展,而承继和发展都存在着路径依赖性。

本文所论述的变零构式是不依托于语法结构的修辞构式,因而这类构式增殖意义的产生往往是对主要成分(如作为定量语的“整位数”)的技术调变(包括利用整位数的文化规约义以及数字本身的计算程序)及基于此而做的语用推理。变零构式表达实现的认知基础是其组构成分整位数(或显或隐)例如“百、千、万”等具有特殊的语用蕴涵义:量大、量多甚至极量、最大量。这些数字在语言文化系统中已经有规约化的语用义(有时由语境赋予)。变零构式的增殖意义“调变全量,凸显零数”的生成基础就是基于整位数的固化的或语境赋予的“全量”涵义及其与零数之间的关系,其具体的生成路径是通过数字最基本的加减计算而形成。也就是说,变零构式都是在某个特定定数的基础上所做的零数调变,因此,其子构式和再下位构式的生成路径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如图2(向右箭头表示数量趋大,左向箭头表数量趋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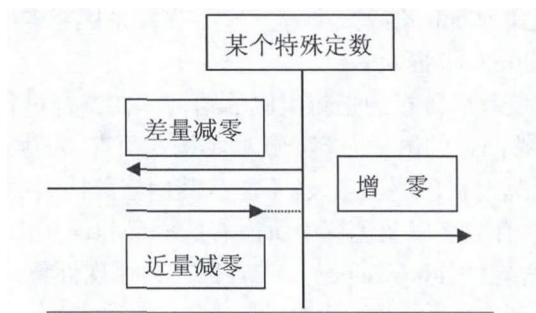


图2:变零构式系统生成路径示意图

从符号性本身出发,不同的形式本就代表不同的意义。数目调变式是对数目词构式的形式调变,所以肯定会带来语义的变化。而由于调变式会形成跟固化构式的认知比较,所以在语上调变式的语义就会因跟固化式的比较而存在一定的语义方向。如增零是基于本身表示大量的某个定数的增加,所以多有程度加深的语义;减零是基于某个定数的减少,所以多有不足、未及等语义。但减零的更复杂之处还在于,存在两个认知方向,因此就有了两种信息结构安排。由此可见,构式的增殖效应有新意,但新意的生成有路径依赖,在路径延展中变异性特征得以凸显,即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苏轼《书吴道子画后》)。就此而言,修辞构式的语义结构呈现出可操作性特征,是一种动态性语义结构。这与“修辞”的本质是相通的,也是它与语法构式的语义有所区别的地方。



而依托于语法构式的修辞构式,其生成路径具有框架依赖性(fame dependency),是在语法构式框架的作用下,借用框架内各组构成成分的结构关系,创新性地使用、借用新的词汇构式,从而整合成新的使用事件。这实际也是一种路径依赖。例如:

(19)韩玄子已经在堂屋里训斥老太婆话太多,又要去喝茶,保温瓶里却没有水了,就又嚷着正在梳头的小女去烧水。(引自刘大为 2010)

显然,如果将“嚷”换成“催、叫”等,“原先那种大呼小叫、颐指气使的姿态就不再呼之欲出了”(刘大为 2010)。暂且不考虑这个使用事件的具体细节和语用效果,“嚷”之所以能进入这个表达中,是因为心理构式库中已经储存了一个“致使-施动”构式。致使的方式既可以是已经常规化了的行为方式(如“催、叫”),也可以在使用事件中临时提取;如果所提取的致使方式具有新颖的经验特征(如“嚷”),便会给人明显的新异之感,即所谓浮现出新的特征。而这种新特征的浮现仍依托于既有的构式及其结构化特征。同样,类似(19)这样的例子,调整一下语境,我们完全可以用“吼、嚎、吵、闹、叨咕、嘟囔”以及“挠、捅、瞪”甚至“哭、哼”等来替换“嚷”,构造出“瞪着正在梳头的小女去烧水”之类的表达;有时虽然可接受度并不很高,但也并非不可能、不合式(ill-formed),如“哭着正在梳头的小女去烧水”。在具体的使用事件中,细节丰富的则呈现出更多的修辞效果,而具有类化特征的用法事件,则会渐渐失去一些细节,但两者的基本结构关系仍然保持不变,这正是路径依赖的基础。可以这样说,依托于语法构式的修辞构式,其增殖效应对使用事件中生成路径的依赖更加鲜明,结构化特征更容易呈现出来。关于构式增殖效应的路径依赖,是个重要的话题,容另文专述。

## 2. 修辞构式增殖效应的创新网络层级

下面以变零构式的图式化程度为例看修辞构式网络系统及构式增殖效应的创新层级。

构式语法视野中的构式,既包括实体性构式(substantive construction,如语素、词、复合词及全固定的习语)、半开放构式(即部分已填充,部分待填的半实体半图式性构式,如“又……又……、The N”),还包括图式性构式(schematic construction,指对词汇完全开放的抽象格式,如句型、句式)。若从一个构式群(construction group)由具体到抽象的概括过程所形成的层级关系来考虑,则可将它们分别称作微观构式(micro-construction)、中观构式(meso-construction)、宏观构式(macro-construction)。这样就可以用分类网络(taxonomic network)来表征构式的层级系统。(参见 Hoffmann 2014 及其所引文献)就此而言,具体的变零表达属于微观修辞构式,抽象的变零格式属于宏观修辞构式,还有居于其中的情况。这里以增零构式为例来说明修辞构式网络系统的建构过程。

我们在第二节描写了增零构式的基本生成路径,显然,对每一个使用事件而言,定量语和将要参与运算的零数,都是一个个微观构式(实体性的词语构式),它们的整合结果也是一个微观构式,即一个个特定的语式(construct)。但对修辞构式而言,存在着一个使用事件抽象概括为用法事件的过程,伴随这一概括过程,对高频语式实例的概括便形成了中观构式,如“ $X+1$ 、 $X+2$ ”或“ $10+n$ 、 $100+n$ ”之类。若干具有共同形义特征的中观构式进一步概括,便形成了宏观构式,即“ $Xn$ ”。这个构式图式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分类网络及其特征承继关系如图3<sup>⑤</sup>。

那么,构式创新即增殖效应的产生体现在哪一个层级呢?Hoffmann(2014)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认为“重要的结构创新首先发生在中观构式层”,然而就修辞构式而言,我们分析后认为,每个构式层都有创新之处,创新的启动来自微观构式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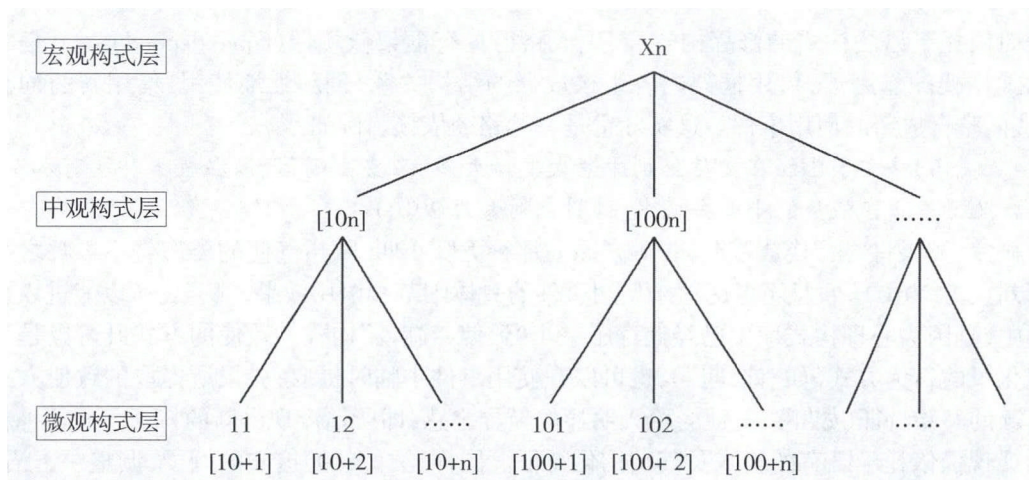


图3 增零构式网络层级关系

进一步说,即便是句法构式,其图式化的起点也都首先来自于具体表达,来自于一次性创新、一次性使用。也即所有构式的创新启动都来自微观构式层。

对具体的修辞表达而言,我们所见到的就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微观构式。显然,修辞构式的创新首先出现在这种一次性使用的微观构式层,如上文所举各例都有其新异之处。这实际也是学界进行修辞分析的基础。接下来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些微观构式中的某个实体性成分固定下来,而另一部分可以填入相关成分的话,就可以因大量的类推使用而形成某种半开放式框架,此时便向中观构式发展。中观构式承继了微观构式浮现出来的特征,但会对使用事件中的具体细节有所取舍,对具体的场景有所剥离,而强化了各个成分之间结构性关系。如例(3)中的“100”已经是心理词库中既有的词语(属于实体性构式),增零的表达方式就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个零数,这样便形成了“101”这样一个新的“形式-意义”配对的微观构式。基于“101、102”之类微观构式的进一步图式化,可以形成“100n”(这里指两者相加,而不是相乘)这样的中观构式,这个构式已经脱离了例(3)那样的具体场景,而主要体现为以“100”为基础的增零。显然,这个中观构式具有较大的能产性,能产性高低视“零数”的具体情况而定。这种半实体半图式性构式的形成,对语言而言,实际也是创新,增加了一种新的表达手段,将微观构式所蕴涵的拓展能力释放出来。若干“10n、100n”这样的中观构式进一步抽象,就形成了宏观构式“Xn”。至此,增零辞格就得以形成。显然,一个新的辞格,对语言交际系统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创新,而且基于这样的创新自然可以引发很多新的使用事件。同样,减零构式也可形成这样的分类网络,每个层次也都呈现出创新性特征。减零构式和增零构式两者合起来就是变零构式。当然,不同构式层中所言的创新,在内涵上实际是有所差别的。语言的创新始于微观构式,它依赖于具体语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修辞构式的创用,对高频语式的实例概括而形成的中观构式强化了语言创新的成果,同时在对微观构式抽象概括的过程中伴随着新的创新,将其形义关系拓展到现有微观构式所未见的表达中去;在此基础上,完全图式化的宏观构式逐步抽象概括而成,此时构式的能产性得到了发挥,并有可能因其向外拓展而形成多义构式。从微观构式到中观构式到宏观构式,这个过程伴随着原型范畴的建构和家族相似性的拓展,甚至还有范畴关系的重组和构式网络的调变(施春宏 2017)。从这个角度来看修辞构式的创新,可以这样说,它是在语言系统允准的空间里,凸显了某种变异方式和特征,通过微观构式到中

观构式的层层创新,逐步产生宏观构式,进而呈现为某些修辞格式(修辞构式)。

当然,就构式网络层级关系而言,很多修辞构式只出现在微观构式层,即体现为一个个具体表达,而没有进一步图式化。而有的则推展到中观构式层,如微观构式“被自杀、被和谐、被信用卡、被 67%、被 G2”类新“被”字式(参见施春宏 2013a),便已推展到“被 + X”这样的中观构式层。有的还能进一步概括到宏观构式层,已经形成的辞格实际上就处于这一层级。显然,从构式的创造性来说,最基础的创造来自于微观构式,而创造力的进一步拓展则来自中观构式和宏观构式,一旦创新的微观构式进一步稳固拓展到中观构式或宏观构式,就成为语言系统(包括修辞系统)的一部分,就不再是创新的“使用”,而是业已稳固的“用法”。实体性修辞构式的出现固然带有偶发性,但其基本路径仍然合乎基本的认知机制及加工限制,并且还是在既有语言系统中的调配和创新,这就是我们上文所言的“路径依赖”的基础。就此而言,修辞表达,往往简单但不寻常,这便是创造。

需要说明的是,上文已经指出,修辞构式的类型复杂多样,有的修辞构式依托于特定的语法构式,有的不然(变零构式即如此)。不是来源于语言线性序列调变的修辞构式,则不依托于语法构式,若依托于语法构式,则是在语法构式的基础上的创造性使用,是在语言线性序列上的调变。一般所谓的超常搭配,都是在语言线性序列上的调变,因此都是依托于语法构式的,如对“很 + N”这样包含转喻关系的构式而言,其存在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语法系统中已经存在“副 + 形”这样的宏观构式,二是其中的名词具有描述性特征(这种语义特征可以是规约化的,也可以是语境赋予的,参见施春宏 2001、2002)。如“副 + 形”一样,“很 + N”也存在形式和意义之间对应性的匹配关系。但不管是否依托于语法构式,修辞构式的网络层级关系及其形成过程与语法构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当然,在实际研究中,人们容易将修辞构式看作微观构式层面的表达,而语法构式更多地侧重于宏观构式,一般框式结构研究及相关的语块研究比较重视中观构式。就此而言,修辞和语法,一次性使用和高频使用,本质上是相通的。

### 3. 关于修辞构式增殖效应分析的方法论原则

上面两小节讨论了修辞构式增殖效应的生成路径及创新层级,这里不妨就修辞构式增殖效应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做些简要说明,这也牵涉到对修辞效果的认识。关注增殖效应的路径依赖,并不意味着只要看到了构式的生成路径和机制,就分析清楚了构式的浮现特征,而只是说我们在分析构式的增殖效应时,要重视对使用事件乃至用法事件的各种特征做出结构化分析,勾画出其中参与事件表达的各种形式成分及其关系,并梳理出哪些是承继的特征,哪些是发展的特征,发展而来的特征又是如何发展而来的。既然辞格乃至一般构式的增殖效应是修辞构式分析的中心论题之一,那么理所当然要重视构式增殖效应的分析方法和方法论问题。

由此可见,就修辞构式增殖效应分析的基本思路而言,需要特别重视对构式和组构成分、构式义和成分义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而这样的考察又可以还原到使用事件、用法事件的结构特征分析之中。上文在分析增零和减零的生成机制和语义增殖时指出,增零和减零这种修辞构式主要都是基于特定数字的调变,增减之中都是为了实现“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的语用效应。我们对其增殖效应的考察,是从现代还原论的角度来认识的<sup>⑥</sup>,将构式的浮现性特征还原到具体的成分(X、n)及其关系(+、-)上,对X所本有或语境所能赋予的语义特征、n的范围及其特征做出描述,然后对“增”和“减”的内容做出描写,借助语用推理,使变零后的浮现性特征有脉可循。这样分析的着眼点是基于构式增殖效应的路径依赖。至于修辞



构式使用的心理机制,则同样依托于这样的路径依赖,但具体修辞构式的心理机制及其表现,则需要专题论述。刘大为(2012)在探讨谐音构式的心理机制时,在区分谐音现象产生的主过程和随激过程基础上,引入分时处理、并行处理这两个概念,指出是并行处理导致了谐音构式的形成,谐音现象中的主过程、随激过程之间存在着语音的双向激活机制。可以说,这样的分析正是符合现代科学还原分析方法论原则的。这对我们认识修辞构式的生成机制具有很大的启发。对修辞构式而言,其生成基础往往是基于语言表达的双层性:第一层次处于底层的是已经规约化了的语言成分及其关系,如变零构式中的定量语和运算规则,“很+N”超常搭配产生的基础“副+形”,谐音构式中被谐成分的音义关系等;第二层次处于表层的是在具体用法事件中对规约化语言成分及其关系的调变性使用。这两个表达层次之间具有结构性对应关系,但第二层次在叠加到第一层次之上的过程中,被具体用法事件赋予了新异的特征。如此一来,正如人们所认识到的那样,修辞构式的语义增殖并非都可以通过构件及其关系的分析完全推导出来,而只具有半推导性(或曰半不可推导性)是常见的情况。即便如此,我们也还需要区分的是,从本体论上看修辞构式的不可推导性和从方法论上对修辞构式的形义特征及其关系做出有效推导,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能因构式存在语义增殖效应,浮现出新的特征且这种效应、特征呈现出某方面的不可推导性,因而拒绝对这种效应和特征做出结构化“分析”。就每一次修辞表达而言,都具有创新性,但唯其具有可重复性,才会形成辞格,而只要是可类推的、可聚类的,都必然有一定的可推导性。如果不对完形的整体特征进行成分和关系的分解,又如何去认识这种整体特征?本质上,整体是有结构的,结构体是由成分及其关系构成的。因此,如何理解“不可推导性”,将构式放到具体语境中是否真的还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不可推导性(若真的存在,则这种不可推导性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则是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

当然,如何抽取使用事件、用法事件中的结构化成分及其关系,如何将这种结构化成分及其关系与语言表达形式、语义特征的成分及其关系对应起来,则需要进一步探索。而且,如何理解构式的浮现性特征,有时还需要引入相关的语用原则,借助语用推理规则,构建合适的分析模型。如为何增零构式能够表示“本已全量,却仍加增”,减零构式为何有差量减零和近量减零两种子构式,而差量减零为何又有两种语义内涵,这显然不是单纯从其内部结构成分及其关系所能说明清楚的<sup>⑦</sup>。但正因如此,我们才需首先从强化对构式浮现性特征、增殖效应的结构化分析入手去探索浮现机制的基本条件,把握/复现其可操作特征。然而,目前构式语法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总体而言比较粗疏,使得浮现性特征的浮现机制和过程显得多少有些神秘。其根源之一恐怕来自对还原分析效度的深刻怀疑和持之以恒的批评,坚持整体论并对浮现性特征做出整体把握,对认知科学中的“计算”本质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实际上,唯有通过对修辞构式生成路径做精致的还原分析,才能使浮现的机制、过程和结果变得更加透明。即便不是所有的特征都能还原、都能通过还原的方式来认识,但基于构式整体结构化过程的最大化还原——“精致还原”是分析构式特征的基本认知策略之一(施春宏 2008、2013b、2016),这是毋庸置疑的。立足整体,重视还原,在析解结构体的成分及其关系基础上建构结构化过程,强化多重界面互动的整合机制分析,正是精致还原主义(精致整体主义)一贯的方法论原则。对此,需要进一步结合具体的修辞构式做出探讨。

#### 四、基于构式的增殖效应看修辞效果的构式属性

与修辞构式的增殖效应至为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修辞学关于修辞效果的认识。换



个角度来看,就是如何参照辞格超常表达特征的分析来认识修辞效果的性质问题。传统修辞学非常倚重修辞现象的美学风格分析。修辞效果虽然只是美学功能的一种体现,但却是很容易看得见抓得着的一面,因此具体到辞格分析,自然容易落实到修辞效果上。就变零而言,无论是增零还是减零,作为一种数字调变的修辞手段,这种推移式递进可以使说理更有说服力,使表达更形象,能够实现一定的幽默或讽刺效果并呈现特定的文化涵义。这就是一般所言的修辞效果。传统修辞学在分析辞格功能、变异表达、超常组合时,往往对此十分关注。但这些修辞效果是如何出现的,跟辞格的形式和意义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传统修辞学研究往往语焉不详,或难言其详。这与其不怎么重视修辞效果的生成基础和浮现机制(语言机制和心理机制)研究有关。

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人们总结出来的修辞效果,很多情况下是语境赋予的,缺少普遍性和概括力。如有教材指出仿词的修辞效果是:“这种辞格给人以新鲜活泼、生动明快的感觉,又能产生强烈的讽刺性和幽默感。”然而,事实上有很多仿词未必“给人以新鲜活泼、生动明快的感觉”,有很多仿词并不“产生强烈的讽刺性和幽默感”。由此可见,人们在归纳修辞效果时,常常体现出用例偏向(example-preference),容易将特定使用事件的语境特征视为修辞格式的修辞效果。

如果将辞格看作一种构式,进而注重于修辞构式的增殖效应,尤其是将修辞构式和语法构式放到统一的框架中去认识,那么就会对修辞效果有一个新的定位。实际上,修辞效果是修辞构式增殖效应所带来的结果。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我们可以将修辞效果看作修辞构式生成的“副产品”。修辞效果并非修辞构式的必然属性,即它不属于构式的形式或意义的必然内容。当然,这并不否定,修辞构式常常具有语用效果偏向性(这也是传统修辞研究对辞格修辞效果概括的基础),具有某些方面的美学风格特征,但我们需要借助制约构式生成的一般认知原则(如范畴化及象似性、隐喻、转喻等)、加工限制(processing constraint,如结构的形义匹配度、构件在构式中的识别度等)和语用推理来对修辞效果的具体内容和表达偏向做出说明。

当然,说它是副产品,并不是说它不重要,也不是说对正在演化的结构没有反作用。郑也夫(2015)将“外婚制、农业、文字、造纸术、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这些人类文明里程碑看作人类进化史上的副产品,而这些现象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与此相似,我们认为修辞效果是修辞构式生成过程的副产品,这只是说修辞效果的出现依赖于构式生成过程中形义关系的匹配和调整,无涉重要性问题。修辞效果的研究值得关注,至于修辞效果体现为哪些特征,如何概括这些特征,同样需要系统研究。

## 五、余 论

本文以变零(增零和减零)为例来初步分析修辞构式的增殖效应问题,从构式研究范式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修辞构式的形义关系及其浮现性特征的生成路径,并进一步探讨了修辞构式的网络系统及其创新层级,同时从修辞构式的增殖效应来重新审视修辞效果的基本性质,以期在修辞研究和构式研究的交汇处探讨修辞研究的发展空间。正如刘大为先生(私人通信)指出的那样,这“也是修辞研究获得现代语言学方法论参照的途径”。修辞研究和构式研究的互动、交融,将使修辞研究获得新的视野和空间。

由变零(增零和减零)以及其他业已概括的基于数字关系调变过程的修辞方式来看,数字调变的认知加工机制、数字调变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关系、数字关系的理解和运用还有待进

一步深入系统地认识。其实,如果向前推一步,很多修辞构式的表达,就是这种增增减减、移移换换、拆拆装装的调整变化的结果,其增殖效应也蕴涵其中。修辞,从技术层面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调变术,是调变艺术和调变技术的结合,关注的是效果;但从生成过程来看,又是语言表达可能性的创新性呈现,而这种创新又合乎基本的认知基础和加工限制,侧重的是机制。艺术重创造开新之妙,技术起引导依循之功,机制作协调运作之用。研究修辞方式、修辞构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调变的起因和效果、调变的路径和方式、调变的系统性和规则性、调变的可能性(边界)和现实性(实例)、调变的浮现性特征和承继性特征等方面的认识和分析。

有先生指出:“我们已经认识到,传统修辞学对辞格的研究之所以难以深入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辞格的表达效果上。表达效果的产生一定是有原因的,在我们研究的辞格范围内,是认知关系改变的结果。所以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为语义描述找到这种认知上的解释性因素。”(刘大为 2001:63)如果从研究策略上考虑,将目光聚焦于辞格表达效果的研究之所以难以深入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表达效果的认识实际上多是从较为模糊的整体论出发的(一般研究似乎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因此需要深入到修辞现象内部的生成机制、各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构式语法对语法表达中语义浮现现象和机制的关注必将进一步推动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和构式分析。

最后想要说明的是,变零这种表达方式具有人类思维的认知共性。前文谈增零时已有举例(美国迪士尼经典动画片 *One Hundred and One Dalmatians*《101 忠狗》、日本电视剧剧和中国同名电影《101 次求婚》)这里再举几例如下(引自网络):

(20)a. I have one hundred and one questions to ask you.(我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你。)

b. They are doing the experiment in a thousand and one way.(他们正千方百计地做试验。)

c. A thousand ways mean 999 ways plus one, and one hundred device means 99 devices and another thrown in.(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

d. Ninety nine percent of inspiration is perspiration!(百分之九十九的灵感乃是汗水。)

前两例是增零,后两例减零(分别属于差量减零和近量减零)。其实不仅是变零,修辞构式虽然从具体表达来看常常表现出较多的语言特性,但若从构式生成机制来看,同样存在很多跨语言共性。这将是修辞类型学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 注 释

目前基于数字调变策略而形成的修辞方式,学界归纳出来的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换算(吴士文 1980),或称折抵(朱文献 1985)、折算(杨荣祥、董仁 2008)、精细(谭达人 1982、1992),或称精算(邢福义主编 2002)、析数(陈世明 1983、1984,黄震云 1984)、设式(王朝君 1998)。无论是在两个数字之间的等量切换,还是将数字化大为小、拆一为多的数据精加工,抑或特殊等式的构拟和计算,都是利用计算、换算、转换等调整变化的策略在数字之间构建新的关联,从而获得特定的语用效果。这些修辞方式中涉及的数字,大多带有随机性,并非基于某个特定数字的调变。那么,能否通过对交际系统中某些特定整位数(如表量大的“万、千、百”)或固定用语中的数字(如“九牛二虎之力”中的“九、二”)进行调变,从而形成特定的修辞方式呢?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以它们为基础,同样可以通过加减乘除之类的数学运算来表达特殊的语用效果。本文所考察的“变零”,即属于

这样的修辞方式。

“增零”作为新发现的辞格被收入谭学纯、濮侃、沈孟璠主编(2010 282 - 283)。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商务印书馆 2016)对“零数”的释义是:“以某位数为标准,不足整数的尾数,比如一千八百三十,以百位数为标准,三十为零数。”(831 页)本文理解与此有些差别,但基本精神一致。

与这类增零现象相关的是固定词语中所进行的数字置换,如:“唐僧闻言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行者笑道:‘如何?我说你护短,你怎么就知他不肯去?你只像我叫你时不答应,半个时辰便了!我这去,但凭三寸不烂之舌,莫说是猪八戒,就是猪九戒,也有本事教他跟着我走。’唐僧道:‘也罢,随你去叫他。’”(吴承恩《西游记》第 38 回)其中的“猪九戒”是在专有名词“猪八戒”所含数字的基础上加上零数“1”而构成,猪九戒比猪八戒更难以对付。这种现象带有仿词的特征(如 猪八戒→猪九戒),可以视为类增零式仿词,同样还存在类减零式仿词(如 猪八戒→猪七戒)。对此本文暂且不论。

施春宏(2000)曾将“增零”定义为:“为实现特定的表达目的,在整十整百这样的数后挂上一个零数,或将固定语中的数目字加上一个零数,构成一个新的数目词,这种方法我们称之为增零。”显然,这样的理解是有局限的。正如刘大为老师(私人通信)指出的那样,“没有特定含义的整位数而增了零,还是在叙实而没有主观性。”这种理解是刘大为老师特别提醒笔者注意的地方。

有时这种增零只是为了提升交际的“关注度”,至于其“程度”是否加深那就是次要的了。相对于语法构式有比较固定的构式义,修辞构式由于没有固化性构式体,有时便没有特别明确的概括性构式义,需要依具体语境来理解。这正是修辞构式的特性之一。这自然会给概括修辞构式的构式义带来很大的困难。

这是刘大为老师提醒笔者注意的,用例也是刘老师提供的。谨致谢忱。此时所增零数以“八十”较为常见,“八十”也可是具有特殊语义、语用内涵的定数词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定数词语中个位数为“九”的数和含“九”的固定语未必都是减零的结果,因为“九”数(如“九十九道弯”和“九死一生”之类)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有表示多数或极量的含义。即“九”在传统文化中又是最大的阳数,“九九归一”,在这种情况下,“九”数就不再是整位数减零而来。像下面这例即是如此:“天界的秘密,天是九重天,下凡的仙女一旦想返回天界便要走上九百九十九年。九百九十九年,董永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脸色煞白,词不及义地对亲戚们说,九百九十九年,她要走上九百九十九年啊!”(苏童《新天仙配》,《收获》1996 年第 3 期)就笔者所见,这种含“九”的极量在诗歌、标题、格言、俗语中比较多见。如有篇小说叫《九十九度中》(林徽因著),有首歌叫《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林利南作词,邝正宵作曲并演唱),有部电视剧叫《九十九只小白鸽》(陈力、宁宁执导),有部选集《宋百家词选》(周笃文编)收词一百九十九首,俗语中有“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这样的话,我们常用“一分天才,九十九分汗水”来鼓励学生和晚辈,民谚中有“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和“江西九十九条河,只有一条通博罗”。又,“九曲溪、九十九岩、九十九座山峰、九十九道港湾”常被用来概举风景区的景点等等,凡此种种。以上有时是当不得真的,有时似乎很真,但也常有凑数的成分在里面。而从表面看来,表示减量的减零如果在整位数上减去“一”,得到的同样也是九数。因此,“九”数的具体内涵需要视具体语境而定。刘大为老师和胡范铸先生都特别提醒笔者注意区分这两种情况。谨致谢忱。

从生成基础来看,减零构式的生成方式,除了像上两例那样在表示大量、极量的数目词(常为整位数)的基础上的减零,还可以在具有特殊语义、语用内涵的固定语中数目字的基础上的减零,如内省例:“没有十年寒窗的功夫,哪怕是九年寒窗,甚至九年半寒窗,也到不了那个境界。”百度贴吧“临清吧”有例:“小妹妹在家过暑假,给家人夸下海口一定学会做饭。果然,从那以后经常在空间里晒美食照片,还谈一些美食心得,看起来这丫头是真上心了。半个月后我问她跟老妈都学会了什么,她回复:十八般武艺学会了十七般。我一看大喜,正要拍她马屁,她又说了一句:一般的不会。”此不赘述。

⑪这几例之间略有差别。例(11) - (13)在实际交际中有全数作为背景:十万个人、全部的女人、全国的人,所以才有绝大多数,而例(14)没有这样的全数背景,所以只是极言其多而无绝大多数之意。这是刘大为老师提醒笔者注意的地方。

⑫在用“九数”表示近量时,由于形式相同,有时近量减零跟表达极量的“九数”不好区分,主要看表达者的视角是在接近定数上还是表示极量上。

- ⑬这种情况实际在句式义概括中也是有所见,如“把”字句语法意义无论是概括为“处置”还是“致使”,实际都不能将“把”字句与其他能够表达致使语义内容的句式区分开来。但相对而言,语法构式义由于有构式组成分的线性序列作为依托,其构式义相对便于确定,如“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可以大体概括为:“通过某种方式,凸显致事对役事施加致使性影响的结果。”(施春宏 2010)尤其是对并不依托语法构式的修辞构式而言,其构式义的概括更添一层困难,需要参照构式的生成过程来概括。
- ⑭构式语法文献一般不区分 use event(使用事件)和 usage event(用法事件),统称为 usage event。我们基于 Widdowson(1978)对 use 和 usage 的区分,以及对构式抽象化过程及其阶段性的认识,觉得有必要将两者区分开来。当然,在不需要特别强调两者的差别时,我们也以“用法事件”来统言之。这与训诂学上所谓的“析言有异,浑言不别”理念相通。
- ⑮这个构式网络层级关系的构建参考了 Hoffmann(2014)的图示。Traugott & Trousdale(2013:17)则分别用 schema(图式)、subschema(子图式)、micro-construction(微构式)来表征这三个层级的构式。另外,就构式的图式化过程而言,也不排除从微观构式直接图式化为宏观构式。但这不影响分析的结论。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三层网络模型只是就构式系统的整体架构而言的,具体使用者、具体交际过程中对特定构式的使用未必依此逐层抽象,而且也不是每个构式都必然有中观层级或宏观层级。
- ⑯区别于“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种经典还原论,现代还原论强调还原不仅要还原出结构体的组构成分及其特征,更要还原出各组构成分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以期回答“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包括“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和“整体小于部分之和”)中“大于/小于”的内容、特征、来源、机制、条件。我们将这种现代还原论命名为精致还原主义(sophisticated reductionism),或曰精致整体主义(sophisticated holism)。参见施春宏(2016)及其所引文献。
- ⑰就增零而言,作为基础的定数,已经是全量的,一旦再加增一个量,自然就违背了“足量原则”。而交际过程是遵循“合作原则”的,既然表面上出现了不合作的情况,那么就一定有某种动因,这便是增零特征浮现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陈世明 1983 试论诗歌的析数法《郑州大学学报》第2期。
- 陈世明 1984 谈新诗中的“析数”《修辞学习》第4期。
- 黄震云 1984 论析数格《修辞学习》第2期。
- 刘大为 2001 《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大为 2010 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上、下)《当代修辞学》第3、4期。
- 刘大为 2012 谐音现象的心理机制与语言机制《当代修辞学》第5期。
- 刘海燕 2002 《网络语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施春宏 2000 增零《修辞学习》第5、6期合刊。
- 施春宏 2001 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与副名组合的可能性《中国语文》第3期。
- 施春宏 2002 试析名词的语义结构《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施春宏 2008 句式研究中的派生分析及相关理论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施春宏 2010 从句式群看“把”字句及相关句式的语法意义《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施春宏 2013a 新“被”字式的生成机制、语义理解及语用效应《当代修辞学》第1期。
- 施春宏 2013b 句式分析中的构式观及相关理论问题《汉语学报》第2期。
- 施春宏 2016 互动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及其研究路径《当代修辞学》第2期。
- 施春宏 2017 构式语法的理论路径和应用空间《汉语学报》第1期。
- 谭达人 1982 浅谈“精细”的修辞方式《语文学习》第4期。
- 谭达人 1992 再论“精细”修辞方式《修辞学习》第4期。
- 谭学纯、濮侃、沈孟璠主编 2010 《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 王朝君 1998 浅谈一种新的修辞方式——设式《修辞学习》第6期。



- 吴士文 1980 一种使数量形象化的修辞方法——换算《中学语文教学》第 12 期。
- 邢福义主编 2002 《现代汉语语法修辞专题》,高等教育出版社。
- 徐旭生 1960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
- 杨荣祥、董 仁 2008 关于修辞新格“换算”的续论《修辞学习》第 4 期。
- 郑也夫 2015 《文明是副产品》,中信出版集团。
- 朱文献 1985 谈一种修辞方式——折抵《修辞学习》第 3 期。
- Goldberg, Adele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Illino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ffmann, Tomas 2014 The cognitive evolution of Englishes: The role of constructions in the Dynamic Model. In Sarah Buschfeld, Tomas Hofmann, Magnus Huber & Alexander Kautzsch (eds.) *The Evolution of Englishes: The Dynamic Model and Beyond*, P160-18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Traugott, Elizateth C. & Graeme Trousdale 2013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ddowson ,H. G. 1978 *Teaching Language as communication*. Oxford: OUP.

## The Multiplication Effect of Rhetorical Constructions and Related Issues : A Case Study of Changing Fractional Amount Constructions Shi Chunhong

**Abstract :**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this paper first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and the semantic multiplication of changing fractional amount constructions, including the increasing fractional amount constructions and the decreasing fractional amount constructions. Then, it structures the hierarchy of changing fractional amount constructions and their sub-constructions. Taking changing fractional amount constructions as instance, the multiplication effect of rhetorical constructions and several related issues are discussed, such as the internal meaning and generative basis of multiplication effect, the path dependency on the constructional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multiplication effect, the network and innovation hierarchy of rhetorical constructions,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multiplication effect analysis in rhetorical constructions and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al prop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al effect. In the en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anguage universals of rhetorical constructions.

**Key words :**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changing fractional amount(increasing fractional amount and decreasing fractional amount), multiplication effect, hierarchical network, rhetorical effect, rhetorical typology